

战后东亚的国际传播 与地区秩序

Zhanhou Dongya de Guoji Chuanbo
Yu Diqu Zhixu

刘建平 /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战后东亚的国际传播 与地区秩序

刘建平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后东亚的国际传播与地区秩序 / 刘建平著. —影印本.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012-5056-1

I. ①战… II. ①刘… III. ①国际政治—传播学—东亚—
文集 IV. ①D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48994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书 名 战后东亚的国际传播与地区秩序
Zhanhou Dongya de Guoji Chuanbo yu Diqu Zhixu
作 者 刘建平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世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20 × 1020毫米 1/16 27印张
字 数 497千字
版次印次 2015年11月第一版 201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056-1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美苏“新帝国”的意识形态神话

战后东亚秩序的“帝国”结构.....	2
从广岛到福岛：日本核灾难的历史学、传播学与政治学.....	56
文明冲突论：被揭示的与被遮蔽的.....	88
从美国的公共外交认识国际传播.....	99

日本“传统帝国主义”的精神复活

战后中日关系的传播政治学.....	108
作为帝国主义政治学的“记忆”与“忘却”.....	123
“中间地带”理论与战后中日关系.....	147
中国对日外交在20世纪60年代的转型及其历史意义.....	175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政治思潮的后殖民状况分析.....	205
日本社会的中国观与战争责任伦理的解体.....	233

中国主体性建构与东亚秩序进化之可能

东亚的中国：地区政治经验与地区主义思想.....	244
战后中日关系的“赔偿问题”史.....	264
东亚的“脱战后”与中日交流的转型.....	279
苏联意识形态与中国的土地政治学.....	296
中国主体性重建：革命史的传播学叙事论纲.....	312
从联合国宪章看主权与超国家权力的关系.....	322

附 录

历史“共同研究”的虚与实.....	332
重读中日关系史：外交需要知识，未可迷信智慧.....	343
21世纪日本的文化外交战略.....	351
“战略互惠关系”的时代定位与政治隐忧.....	361
虚构“人性”的另类恐怖主义.....	370
东亚战后史反思.....	379
告别90年代.....	388
重温新民主主义.....	393
战后东亚秩序与中日关系的症结.....	403
知识是思想存在的前提.....	412
后 记.....	426

美苏“新帝国”的意识形态神话

战后东亚秩序的“帝国”结构

2013年8月15日，虽然并非特别的周年纪念，日本政府的言动却受到罕见的国际关注：安倍晋三首相以奉纳祭祀费代替参拜靖国神社，似乎是“顾虑”中、韩等国反应的安排；但他在“全国战歿者追悼式”的致辞却取消了多年来历代首相表明反省战争责任、坚守“不战誓言”的部分，代之以“谦虚面对历史”、“尽力贡献于世界永久和平”的抽象论。^①对此，中国舆论再次掀起一个批判小高峰，表示：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约》“没有解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1971年的美日《归还冲绳协定》“非法、无效”，日本政治的严重“右倾化”威胁亚洲各国；不管日本领导人以何种形式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都意味着否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挑战二战结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要“以实际行动”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否则“同亚洲邻国的关系就没有未来”。^②

中日关系紧张从“钓鱼岛危机”向历史意识形态斗争扩大化，从具体问题摩擦发展到原则性话语对抗表达的象征秩序崩溃，反映着外交无解导致的敌意失控。但美国仍然作出掌握东亚国际关系基调的姿态：参议院全体会议于7月29日通过指责中国在钓鱼岛海域“威胁”改变领土现状、强调日美安

^① 「安倍色にじむ式辞」、「安倍首相の式辞」、「朝日新聞」2013年8月16日。

^② 汤重南：《从国际条约视角论钓鱼岛主权归属中国》，《人民日报》2013年8月15日，第3版。张健：《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历史根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8月16日，第1版。《中方紧急召见日驻华大使表示强烈抗议和严厉谴责》，《人民日报》2013年8月16日，第3版。

保条约适用的决议案；该决议案的主要推手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内德斯8月15日前到访日本时受到感谢，他则赞赏安倍不参拜靖国神社是“深思熟虑”、“洞察未来的决断”。^①梅内德斯还于16日访问台湾，然后去韩国、中国。而此前的8月8日，日本官房长官在首相官邸会见了台湾对日交流代表机构“亚东关系协会”会长李嘉进；该会实际上由“中华民国外交部”所管，会长初次得见日本主要阁僚意味着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一个中国”原则被公然突破。据称，李会长就4月台日缔结“渔业协议”表示了对安倍的感谢。^②

一方是“非法、无效”之类传统冷战时代无数次抗议语汇的复活，一方是我行我素挑拨政治尊严神经的心理战。从这种中日冷战险恶化、台湾“国际地位”被刻意突出的东亚政治构图，清晰可见对1970年代中日、中美建交所构造的“正常化”地区秩序的颠覆性反动。所谓“挑战二战结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论概念是否准确，礼崩乐坏的“秩序”危机感是明确的。苏联解体后“全球冷战结束”以来，发展主义、全球化话语的国际传播在中国得到热烈反响，而对于规定美、日、中三国关系结构的战后历史遗留问题仍然缺乏实证研究和思想整理。现在，以2012年“钓鱼岛事变”为出发点，主要表现为中日关系危机的东亚冷战政治活跃化，搁置“钓鱼岛问题”和“台湾问题”条件的“正常化”地区秩序已经被动摇；作为学术研究，必须在战后东亚政治发展史和地缘政治秩序原理的意义上给以逻辑解明和前景评估。

多年来，东亚研究既有“共同体”发展主义叙事，也有“多边安全机制”之类中美战略合作构想；但“钓鱼岛危机”的爆发不仅让“东亚地区主义”显得是一个幻想，而且连“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也在日美同盟威慑中国的事实面前销声匿迹，代之以欲言又止、闪烁其词的“军国主义论”、“帝国主义论”老调。话语含混、概念陈旧是知识贫困、思想混乱的表征，既不能有说服力地表达中国的利益和立场，反而招致更深刻的误解和猜忌——日本不断恶化的对华民意和美国不断打压中国“钓鱼岛主张”的态势就是明证。

① 「公明・山口代表、米上院外交委員長と会談」、『朝日新聞』2013年8月15日。「首相の靖国参拝見送りを評価 米上院外交委員長」、『日本経済新聞』2013年8月15日。「首相「同盟の重要性高まる」 米上院外交委員長に」、『日本経済新聞』2013年8月15日（夕刊）。

② 「台湾対日窓口機関の会長、官房長官と初の面会」、『朝日新聞』2013年8月11日。

因此，系统地探讨战后东亚地区政治史，从具有实证意义的现象逻辑和所能把握的外交过程出发来探讨国际政治的传播结构，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紧迫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战后世界的“新帝国”与东亚地区秩序

在世界历史上，大国战争特别是涉及所有大国的世界大战，是人类价值观变革和国际秩序转型的分界线。古代东亚地区的中华帝国作为农耕文明中心，没有直接统治周边小国的意识形态和技术能力，主要以文化传播、贸易交流维持了礼治主义朝贡体制。到近代，欧洲人的航海活动、工业化、民族国家化使他们发现并具备了战争能力征服美洲、非洲和亚洲，东亚的中华帝国战败而半殖民地化；曾经的朝贡国日本效法欧洲资本主义改革而列强化，先把琉球王国强行纳入地方统治，又在19世纪末对中国发动甲午海战，中国被迫向日本割让台湾并承认朝鲜“独立”，东亚朝贡体制彻底崩溃。其后，日本吞并朝鲜继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力图建立军事殖民主义统治；但由于与欧美、俄国的利益冲突，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东亚的日本帝国主义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就被反法西斯盟国打垮而终结了。

处于政治变革的全球传播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典型的意识形态性。“联合国”高举自由、独立、正义和平等价值理想旗帜，摧毁近代列强炮舰政策的军事殖民主义秩序，形成了既是新兴经济、军事大国又具有意识形态生产能力的美国、苏联所控制的“两极格局”。斯大林曾经解释“这场战争”与过去不同，说：不仅是占领一片土地，还将社会制度“加诸其上”，并且“绝对没有例外”。而杜鲁门持类似的信念：彻底击溃、降伏敌人，然后帮助他们复苏“成为民主国家”，加入国际社会。^①战后世界就在这种意识形态性质的军事控制和制度植入意义上，筑起以“自由制度”与“极权政体”或“帝国主义”与“人民民主”二元对立话语标志的“两个阵营”；美国、苏联居于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379页。

各自阵营卫星圈的核心，正如“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邪恶帝国”等政治攻讦所指，是事实上存在的战后具有超国家权力的“新帝国”。

但“新帝国”在欧洲和东亚建立的地区秩序有着结构性差异。关于对意大利、德国等欧洲战败国的占领，美、英、苏在战争期间就议定设置盟国管制委员会，对德国更明确了美、苏、英、法分区占领体制；这样，意识形态对抗国家、战争受害国家的多元化权力结构所造成的“势力均衡”性和传播主体、利益表达的对称性，决定了欧洲的战犯审判、受害赔偿等战争责任处理具有比较客观的彻底性和公正性。而且，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得到了西方阵营的现实主义尊重，这意味着两个阵营在欧洲的边界稳定和苏联直接处于冷战对峙的前沿，即与美国对抗的责任主要由苏联承担着，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均势”。所以，冷战时期的欧洲既维持了国际和平，又实现了战后和解；随着苏联推进政治改革和放弃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欧洲的冷战秩序瓦解而实现了一体化统合的共同体政治。

东亚地区则由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其冷战战略利益压倒了通过战争责任处理实现东亚国家战后和解的逻辑，美国既是“阵营对抗”意义的战略性帝国，也是庇护日本逃避战争责任意义的地区政治结构性帝国，日美关系成为地区秩序的主导结构。在日本投降前的盟国首脑“波茨坦会议”期间，1945年7月26日发表的《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没有规定占领管理体制。那时，美国对日本投降的估计是在1946年，登陆本土作战要牺牲50万美国人的生命；并且苏联迟迟不明确参加对日作战的具体日期，美国就暗中准备用最新研制的原子弹轰炸日本，“以强迫敌人立刻屈服”，决意“不容俄国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①在日本无视《波茨坦公告》并鼓吹顽抗的情况下，美国第一颗原子弹于8月6日轰炸日本广岛。苏联本来把压迫中国接受损害权益的《雅尔塔协定》作为对日参战的政治条件，这时便不等中苏缔约谈判完成（8月14日）即于8月9日加入对日战争，而美国又把第二颗原子弹投到日本长崎。丧失了战斗意志的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由天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李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313、315—316、318页。

皇广播“终战诏书”，向盟国投降。^①在日本乞降和美苏争夺主导权的过程中，美国拒绝了苏联关于“盟国最高统帅”可以为两人的建议，杜鲁门总统于8月13日任命麦克阿瑟将军为占领日本的“盟国最高统帅”，规定“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将隶属于”麦克阿瑟；杜鲁门还拒绝了斯大林关于由苏军在日本北海道受降的要求。^②这样，日本向盟国的投降演变为向美国的投降，单独占领体制决定了日本“隶属于”美国的军事统治——历史学家把麦克阿瑟称为日本“新的君主”、“殖民总督”、“蓝眼睛的幕府将军”，而当今日本学者的反思精神仍然顽强，流行着悲情的“主权在美”史观。^③

美国能够让苏联默认单独占领，除了强大的“原子弹效应”，适当“放手”让苏联取得东欧势力范围和日苏有历史争执的千岛群岛，还在于通过日本天皇权威的信息操作来强化麦克阿瑟的统治权力。事实上，苏联、英国乃至美国当局内部，对于麦克阿瑟权限的理解存在分歧，即认为盟国所达成共识的是“为落实投降条款而采取必要措施的盟国最高司令官”，这种“鉴于日本突然投降而发生的紧急性”所任命最高司令的目的“限定于”处理受降，“不是连续性权限而是临时性的”。^④日本投降初期，苏联由于占领北海道的要求被拒绝，曾经威胁要设法免去麦克阿瑟的最高统帅职务；英国则提议在东京设置政策决定性质的盟国管制委员会，但美国只同意在华盛顿设置“远东咨询委员会”。1945年9月24日，苏联也提案要求在“军事性局面结束后”设置处理政治、经济课题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对此，美国作出一定的让步，在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盟国决定设立由十一国代表组成的具有制订政策原则、“考核”最高统帅行政之权的“远东委员会”，以及由美苏中英等国代表组成的作为最高统帅商讨、咨询机关的“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⑤

① 「大東亜戦争終結に関する詔書」、竹内実編『日中国交基本文献集』（下巻）蒼蒼社、1993年、135頁。

②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李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332、340、342页。

③ 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78页。「ノンフィクション時評 9月『主権在米』史観」、『毎日新聞』2012年9月25日（夕刊）。

④ 豊下梢彦『昭和天皇・マッカーサー会見』岩波書店、2011年、44—45頁。

⑤ 《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页。《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设立远东委员会即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的决议》（1945年12月27日），《对日和约问题史料》，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7—19页。

作为反击，麦克阿瑟则利用日本天皇加强自己的实权。从美国的占领政策而论，保留天皇的象征权威以利于占领是既定方针；但事实上的利用比这种一般论复杂且微妙。麦克阿瑟初到东京时，其参谋人员曾建议把天皇召来以“显示我们的权势”；但他的判断是“等待”天皇“求见”，“东方的忍耐而不是西方的仓促更能达到我们的目标”。等到麦克阿瑟的权限受到盟国质疑、限制，同时也是要求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国际舆论高涨之际，日美当局就“商妥”由天皇出宫于1945年9月27日到美国大使馆“访问”麦克阿瑟了。据麦克阿瑟回忆录的记述：天皇承认对战争“负完全责任”，表示是来“投案并接受审判”的；麦克阿瑟则认为“不是他的责任”，并感到天皇“理解民主思想”，肯定其“真诚合作和影响”对“占领的成功”有重大意义。^①但当时报道的内容是：麦克阿瑟感谢无流血的顺利占领得益于天皇的权威；天皇对麦克阿瑟不言及战争责任很感动，认为“最终判断不得不有赖于历史学家”；麦克阿瑟欢迎天皇任何关于日本重建的提议，天皇就表示对占领的进展非常满意。^②这种新闻传播导向非常明显，在于搁置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确认“政治利用”天皇、天皇与麦克阿瑟合作的重要性。而事实上，即使是日方翻译也承认麦克阿瑟对天皇有“严肃”的“演说口吻”。^③总之，美国占领当局对外淡化战争责任而突出日美合作，幕后则强调天皇向麦克阿瑟承认负有全部战争责任并愿意接受处罚，要求日本方面在战犯审判问题上尽力合作以使天皇免责——这是一种从道义高度控制“人质”权威、建构占领权力秩序的政治传播。而“负有”但被免去战争责任的天皇当然积极与麦克阿瑟全面合作，天皇权威也就被政治利用而强化了麦克阿瑟的中枢地位和美国控制日本的权力结构。此后，从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召开到会议所决定的远东委员会于1946年2月成立期间，盟军总司令部迅速发出了关于“国家与神道分离”的指令、关于日本民主化基本指令的声明、关于废弃天皇制度的声明、麦克阿瑟欢迎天皇“人格宣言”的声明、修改宪法的“麦克阿瑟三原则”和宪法

① 《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184页。吉田茂：《十年回想》第一卷，韩润棠、阎静先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54、60页。

② 豊下梢彦『昭和天皇・マッカーサー会見』岩波書店、2011年、10—11。

③ 吉田茂：《十年回想》第一卷，韩润棠、阎静先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61页。

草案，造成在麦克阿瑟统治下重建战后日本基本政治框架的既定局面。^①相应地，远东委员会和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即使成立了也被形式化，不能对美国占领政策和麦克阿瑟行政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甚至到了日本新宪法施行（1947年5月3日）之后，麦克阿瑟仍然违宪利用天皇权威探索对日和约缔结之后美国继续占领冲绳的途径。6月27日，他对美国记者团谈话说：“冲绳诸岛，是我们的天然国境。对美国保有冲绳，我不觉得日本人会反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冲绳人不是日本人，而且日本人已经放弃了战争。在冲绳部署美国的空军，对日本有重大意义，非常明显会成为日本安全的保障。”他还相信，只要使苏联占有千岛群岛的对日要求得到满足，苏联就不会强行反对和约。^②不久，天皇的顾问寺崎英成特地向盟军总司令部传达天皇希望“美国继续军事占领冲绳及其他琉球诸岛”、可以在主权保留于日本的情况下长期租借“25年到5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口信，美国方面就此于9月20日作成了“麦克阿瑟将军备忘录”。^③这意味着，麦克阿瑟是足以操纵天皇违背规定其“象征性”的新宪法而干预国政的“超日本国家”性质的存在；以天皇战争责任的暧昧化换取日本“统治权威”与麦克阿瑟“占领权力”合作的机制，保障了美国在战后东亚的权力扩张。

对于美国的战后权力扩张，苏联以重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制作对抗。一般说来，1947年9月提出“两个阵营”理论、组建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战后苏联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制的标志。事实上，虽然共产国际于1943年解散，但由于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野坂参三（冈野进）于1940年3月秘密来延安领导日本人反战运动，中日两党的合作以及与苏联党联系的存在，使得苏联影响东亚政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式一直延续着。^④而随着对日决战的来临，面对美国势力的扩张，苏联高层更加紧探索控制战后东亚政治进程的渠道。1945年8月10日，曾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共产国际

① 豊下梢彦『昭和天皇・マッカーサー一会見』岩波書店、2011年、20—23と46—50頁。

② 新崎盛暉：《冲绳现代史》，胡冬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1—22页。

③ 孫崎亨『戦後史の正体』創元社、2012年、87頁。

④ 刘建平：《野坂参三与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认识——新中国对日外交思想探源》，《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第76—93页。

解散后任联共中央国际情报部部长的季米特洛夫和副部长波诺马廖夫给斯大林等提出报告，建议“利用冈野进同志的组织”。日本投降后，驻东北的苏军从张家口接应野坂，送往莫斯科。^①

苏联军方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和波诺马廖夫接见了野坂。野坂在10月11日的会谈中提出希望苏联帮助日共重建组织、给以政策指示和资金援助、解决日共与莫斯科的正常联络等问题；苏方表示“关心日本成为民主主义国家，希望与民主日本建立友好的关系”，同时又指出“完全明白处于美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之下日本形势的困难”。12月初，野坂又被秘密送回中国东北，取道朝鲜半岛，于1946年1月回到日本。^②这样，苏联在野坂归国前解决援助日共的技术性问题，在确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制和反对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地区政治意义上重建了与日共的关系。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中共就苏联援助新中国进行具体沟通，斯大林又把中共纳入了东亚冷战的战略规划。1949年6月26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翌日，斯大林在第一次会谈中主要谈了经济、技术援助等问题。7月4日，刘少奇向联共（布）中央、斯大林提出书面报告，以“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原则，表示中共“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对此，斯大林在7月11日的会谈中略有谦辞，承诺将帮助和支持中共建国。^③

解决了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等中共的迫切关心事项，斯大林在7月27日的宴会和会谈中着重阐述了国际问题。他说：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应该有某种分工合作。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你们应当与日本共产党建立密切的联系。现在美国正争取日本，如果美国在日本达到目的，以后中国的困难就会大；如果你们能把日本争取到你们方面来，那资本主义在远东从此就要完蛋。因此，日本走向哪

^① 不破哲三『日本共産党にたいする干渉と内通の記録——ソ連共産党秘密文書から 下』新日本出版社、1993年、267—268頁。イワン・コワレンコ（清田彰訳）『対日工作の回想』文芸春秋、平成8年、39—40頁。

^② 和田春樹『歴史としての野坂参三』平凡社、1996年、129—130と148—151頁。「野坂議長にきく 延安から東京まで」（20と21）、『赤旗』1971年9月4日と5日。

^③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7、21—22页。

一边，是带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日本人民是很好的，中国人民中仇恨日本人的情绪，不该成为你们争取日本的阻碍。但日本上层还有反动分子没有被打下去。今后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很好地帮助日本共产党及其他进步势力，打击日本反动分子，以便能够把日本争取到你们方面来。^①这些指示把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原则和新中国的安全战略联系起来，建构了苏联中心、中日共同反美的东亚象征权力。

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出访苏联于1950年2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则是东亚反美阵营的国际政治体制化。条约序文和第一条是“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的同盟安全内容；第二条是“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即以共同行动和相互支持保证彼此战后大国外交地位的内容。^②关于战后对日议和之类的外交和国际法问题，毛泽东没有什么心得，他所满足的是：有了“用条约把中苏两国的友谊固定下来”的“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③。这是脱离实际的苏联意识形态教条造成的重大战略错觉。在日本尚未投降之际，中华民国与苏联签订共同对付日本的“同盟条约”还可以理解；但在日本投降并解除武装、采用放弃国家战争权力的和平宪法之后仍然假定其为侵略敌国，并且用“与日本勾结”特别暗示与“美帝国主义”对抗，中国就被苏联纳入了反美冷战——控制中国而牵制美国——的同盟政治轨道，另一方面则被美国利用作了继续驻军东亚和扶植日本反华的借口。

与毛泽东访苏同时，日共也与中共中央秘密联络，派出战前曾在中国学习、工作多年的经济调查代理部长安斋库治作为常驻代表到北京，建立起两

^① 斯大林谈话记录（1947年7月27日）。可参阅：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370页；《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51页；刘建平：《“中间地带”理论与战后中日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78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人民日报》1950年2月15日，第2版。

^③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4月11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党协调机制。而苏联以国际象征权力推动反美革命，斯大林于1950年1月在欧洲情报局机关刊物上发表匿名文章《关于日本的形势》，批评野坂参三坚持议会民主的“和平革命”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粉饰帝国主义对日占领的理论”，要求“为立即缔结公平的对日和约，为从速撤退驻日美国军队，为保证各国人民间持久和平而进行坚决的斗争。”^①在中共也表明批评态度之后，日共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主流派领导人作出妥协，接受情报局意见。^②岂料，美日统治当局迅速作出反应，以苏联的“指挥和控制”使得日共“决定贯彻暴力革命主义”为口实展开“赤色整肃”。^③1950年年底，日共主要领导人潜行到北京，建立了以德田、野坂为核心的国外领导机关。这一领导机关接受斯大林提出的暴力革命纲领，在国内发起了一些袭击警察、组织山村工作队之类很快归于失败的所谓“军事斗争”，又成为日美阵营更加敌视新中国的根据。

作为一个更大的东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略，斯大林在新中国成立后支持金日成统一被美苏分裂了的朝鲜半岛，但拒绝在联合国安理会作出阻止美国武装干涉的政治努力，并要求中国出兵参战。1950年8月27日，斯大林在给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的绝密电报中解释说：苏联没有出席6月底7月初的联合国安理会以阻止联合国派兵干预朝鲜战争的决议，就是为了让美国获得多数支持而“干蠢事”；美国“陷进了”武装干涉，“并使中国加入”，美国就“被牵制在远东”。“这就为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时间”，中美斗争在亚洲和远东地区也会引发革命——“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观点来看”当然

① 「野坂の『平和革命論』に対するコミンフォルム批判を発表した機関紙編集会議議事録」(1950年1月5日)。附属資料9、小林峻一・加藤昭『闇の男 野坂参三の百年』文芸春秋、1993年、251—254頁。《关于日本的形势》，《人民日报》1950年1月11日，第1版。

② 『日本共産党戦後重要資料集』(第一卷)、351と384頁。袴田里见：《我的战后经历》，周斌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8—49页。

③ 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二卷，阎静先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190页。

“对我们有利”。^①但事实上，美国本来就极力寻找借口保持在日本、朝鲜、台湾驻军即甘愿“被牵制在远东”，因此反而抓住朝鲜战争造成与中国、苏联关系尖锐敌对化的机会，在拖延了数年之后于1951年9月推行排除中国、排挤苏联、庇护日本逃避实质性赔偿的“宽大”对日议和，实现了重新武装日本、缔结保证长期驻军日本的《日美安保条约》、以日台和约（1952年）与美台防御条约（1954年）分裂中国等战略目标。这样，美日、中苏阵营对抗模式的东亚冷战体制结构就固定下来。

如此，通过推动或支持日共、朝鲜、新中国与美国的对抗，苏联在东亚获得了反美阵营意义的“帝国”地位，而美国则通过朝鲜战争“威胁”下的对日议和实现了长期占领日本的合法化。美国把日本作为“遏制共产主义”的同盟政治工具，苏联与“一边倒”的中国结盟对抗美日阵营，貌似一种冷战“均势”；但对中国来说极其困窘的是，由于斯大林的“中苏分工论”和中国出兵朝鲜，事实上是中国处于与美国、日本对抗的前沿，即东亚的冷战政治压迫集中于中国，意味着中国承担起中苏阵营的直接牺牲。在这种美苏主导、中国受苏联控制而被美日遏制的东亚冷战秩序下，战争责任、战后东亚和解的议题被压迫于美国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冷战政治逻辑之下——扶植一个拒绝战争责任并迅速复兴的日本对中国意味着民族精神蔑视、国家安全敌视复合的无上打击。日本付出被军事基地化的“工具成本”，但获得了逃避战争责任的利益；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其利益、尊严却受到冷战政治压迫、战争责任拒绝之双重的损害和屈辱。东亚战后和解政治的荒废造成敌对化的中日关系结构，使得美国成为一直到现在仍然被或积极或消极依赖的“战略平衡”力量；作为战略理论生产和操纵东亚地区政治的中枢，美国已不同于世界殖民战争时代的“帝国主义”侵略者，而是战后新殖民主义时代被依赖的“帝国”。

^① 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在2005年公布的这份电报，中国学者沈志华发表在2007年第5期《史学集刊》的论文《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根据俄国档案文献的最新证据》中有全文引用，2008年6月25日韩国《中央日报》报道了韩国学者金东吉使用这份电报重新解释朝鲜战争起源的情况，中国《环球时报》在2008年6月26日有简短译介，日本媒体也有介绍。这份电报生动地证明了斯大林冷战外交追求国际政治优势和阵营权力地位的谋略性，中美交战既有利于苏联巩固欧洲势力范围，也使中国更加依赖苏联。